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赵建平 路宝利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河北省 2016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HB16JY038）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赵建平 路宝利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赵建平, 路宝利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41-8086-2

I. ①中… II. ①赵… ②路… III. ①职业教育-教育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G7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2854 号

责任编辑: 周国强

责任校对: 徐领柱

责任印制: 邱 天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

赵建平 路宝利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21.5 印张 340000 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41-8086-2 定价: 6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前 言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劳动分工就有了不同劳动的技能传授活动。广义而言,这种技能传授活动便是原始的职业教育形式。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现象、制度和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和实践探索,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回顾和研究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思想成果,广泛吸收我国古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宝贵思想与有益做法,探索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推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科学发展,是当今职业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尽管中国古代的职业教育现象客观存在,由此生发的职业教育思想源远流长,但是在经学思想主导下的官修史籍中,除了极少的技术职官教育部分被纳入官办教育体系,其余绝大部分涉及农、工、商、医等职业教育现象和职业教育思想都以“隐性”的形态存在于史料典籍的记载中。春秋战国时期的《墨经》《考工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民要术》、北宋时期的《梦溪笔谈》、明代的《天工开物》等科技著作,不仅记载了我国古代精湛的科学技术,也蕴含了丰富的古代职业技术教育思想。中国古代还涌现了大量反映不同行业技术的著作和教材,如:农业技术著作有西汉时期的氾胜之著《氾胜之书》、东汉时期的崔寔著《四民月令》、宋代的陈旉著《农书》、元代的王桢著《农书》、明代的徐光启著《农政全书》等,医学著作有马王堆汉墓

医书《黄帝内经素问》、东汉时期的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唐代的孙思邈著《千金方》、明代的朱丹溪著《格致余论》和李时珍著《本草纲目》等,畜牧兽医技术教材有明代的《元亨疗马集》、清代的《养耕集》等,建筑技术教材有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明代的《园治》《髹饰录》等,经商计算教材有明代的《算法统宗》《盘珠算法》等。这些大量史料典籍为深入研究我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素材。

对于中国古代职业教育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既是职业教育院校教学和科研的现实需要,也是为我国当代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传统文化滋养、注入改革发展源动力的客观需求。在学术价值方面,一是增强职业教育理论的“中国话语”,为当今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注入“本土元素”;二是廓清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原点和路径,从古代百家思想著作、官修史志和农、工、医、商等史料文献中考据中国古代朴素的职业教育形态和隐性的职业教育思想表达;三是力求对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作系统的梳理,形成较为独立、系统、完整的理论研究成果。在应用价值方面,一是把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研究成果应用到教育教学实践中,满足职业院校的教学、科研需求;二是研究过程和成果注重“古为今用”,探索用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宝贵基因解决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困惑和实际问题。

目前,对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见诸少数教育史学著作和部分学术论文中。如路宝利所著的《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史》、米靖所著的《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孙培青所著的《中国教育思想史》、郭齐家所著的《中国教育思想史》等著作,对先秦以降的墨子、孔子、管仲、徐干、傅玄,颜之推、胡瑗、颜元等古代思想家及其职业教育思想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阐述。另外,通过检索发现,与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相关的公开发表论文较多,其中包括刘立琴的《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新探》、李英杰《论孔子的职业教育思想》、刘海林的《管仲与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发展起源》等。尽管这些宝贵的研究成果未能系统归纳、整理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

性职业教育思想，特别是没能重视农、工、商、医等史料著作中蕴含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但是这些成果依然为本项目作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基于上述原因，一种使命感驱使著者写出一本整理和反映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著作。尽管深感自己对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方面的研究不多，积淀浅薄，但是在路宝利研究员的鼓励和支持下，凭着多年从事《教育学》《中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的基础和一股由责任而生发的勇气，借助课题组的集体智慧和力量，边学边研、边研边著、边著边学。因此，写作的过程也是著者自身对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整理、认识、理解的过程，同时也是集体智慧汇聚、碰撞、升华的过程。

在研究方法的选择和运用方面，考虑到对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研究既属于职业教育学研究范畴，也属于中国古代史研究范畴，因此，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论作为指导和把握本研究的根本方法，把“教育事实”作为教育思想产生的基础和根源，把史料典籍、著作文献作为考据提炼“教育事实”、分析归纳教育思想的基本依据和素材，从中查找和提炼有关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内容，并结合不同朝代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注意经济政策、文教制度和其他思想元素同职业教育思想的相互联系以及对职业教育思想的影响。

中国职业教育思想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历史文献资料。首先是全面选择和搜集研究的文献资料，对收集到的文献资料进行甄别筛选，判定其价值、类别、属性等；其次是对文献资料作进一步的细化分解，以历史阶段和具体人物为标准划分成若干研究个案，通过对史料的归纳和分析，对职业教育现象作出判断，对历史人物的论述进行观点总结，形成初步的结论；最后是汇集个案研究结论，对各个历史阶段的具体人物思想观点进行整合，抽象成系统的思想理论，基本反映出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

本研究的着力点是“挖掘”和“整理”，力图通过总结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职业教育发展概况，介绍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生发展过程中的若干代表

人物、典型著作等，阐明这些主要代表人物在其著述中直接或间接表达的有关职业教育的朴素思想观点。研究的原点追溯到具有职业教育属性的原始社会后期的劳动教育，终点确定为国内史学界通常划定古代、近代分水岭的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的职业教育。除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经线”之外，还把关涉中国古代职业教育发生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背景以及士、农、工、商、医职业教育思想研究作为“纬线”，也作为研究的路径和写作的架构。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基本采用年代排序。

任何教育现象、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存在都是与时代的发展相契合的。一方面表现为这种教育现象和思想能够适应时代发展的先进性，另一方面表现为受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制约的局限性。同时，职业教育自身也具有其内在的发生发展规律。因此，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中的能够反映职业教育内在规律、适应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优秀基因不会因为历史的变迁而失去其价值和光彩。正如我国当代的思想文化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一样，当代中国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深厚滋养。所以，挖掘和整理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其价值绝不仅仅在于反映古代职业教育现象和思想存在的客观史实，同时必须对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进行考量，通过深入分析每一历史阶段的职业教育基本特征、思想贡献以及历史局限性，来寻求对当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借鉴意义。

在课题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中国历史文化浩如烟海，仅仅从古代教育思想方面看，也堪称博大精深。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涉及诸多知识领域，面临诸多研究难题，足以让人望而却步。但是，“千层之台起于垒土”，本书如能为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研究的“千层之台”贡献“垒土”之力，自当满足心愿。因著者学识、能力水平所限，加之时间较为仓促，书中内容难免多有欠妥之处，所持观点亦为管窥之见，但求抛砖引玉，以期引发各位学者同仁以及广大读者的深入思考和广泛共鸣。



第一章

原始社会劳动教育及职业教育意识萌芽 / 1

第一节 原始社会劳动教育的主要形式 / 3

第二节 原始社会的职业教育意识萌芽 / 9

第二章

夏、商、西周职业教育思想奠基 / 15

第一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职业教育概况 / 16

第二节 夏、商、西周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奠基 / 25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 37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概况 / 38

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 46

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 71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职业教育概况 / 72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 80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 103

第一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职业教育概况 / 104

第六章

第二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 114

隋唐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 135

第一节 隋唐时期的职业教育概况 / 136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职业教育思想 / 151

第七章

宋代的职业教育思想 / 171

第一节 宋代的职业教育概况 / 172

第二节 宋代的职业教育思想 / 182

第八章

元代的职业教育思想 / 207

第一节 元代的职业教育概况 / 208

第二节 元代的职业教育思想 / 221

第九章

明代的职业教育思想 / 235

第一节 明代的职业教育概况 / 236

第二节 明代的职业教育思想 / 255

第十章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职业教育思想 / 283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职业教育概况 / 284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职业教育思想 / 299

参考文献 / 327

后记 / 331

中国古代职业教育
思想研究

Chapter 1

第一章 原始社会劳动教育及职业 教育意识萌芽

原始社会（约公元前170万年～公元前21世纪）是人类所建立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可以分为“原始人群”与“氏族公社”两大历史阶段，其中氏族公社阶段又分为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两个时期。考古研究表明，大约170万年前至1万年前为中国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距今大约5万年至5000年为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距今大约1万年至5000年之间是新石器时代，是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过渡的历史时期。距今约四千多年前，是传说尧、舜相继掌权的时代，相当于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是我国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起源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教育产生于人类的生产劳动中，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同时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人类在远古时代为了生产、生活和自身繁衍发展，必须进行教育活动。考古学发现和考证了原始社会普遍存在生产和生活技能技术传授活动，即原始的劳动教育。建立在原始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原始劳动教育具有鲜明的生产性和实践性，已经具有了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

原始的职业性教育活动必然会在人们的头脑中有一定的反映，产生主观的思想认识。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①在漫长的年代里，这些主观意识不断积累和丰富着，又经过抽象、整理和深化，逐渐形成简单而零星的教育观念。到了人类有了文字的时候，人们的教育观念才变得比较复杂而有系统。后世典籍中记载了原始社会后期“圣人为师”，“教化先民”的教育传说以及“设官教民”等教育现象与制度，使这些人类早期教育思想得以保存和延续。因此，最早的传世文字记载的历史是探索中国古代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第一节 原始社会劳动教育的主要形式

旧石器时代的教育活动仅仅是人类代际间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传授，作为一种生存教育在远古时代长期存在。原始社会后期，氏族公社的社会组织形式和新石器为标志的生产工具广泛使用带来原始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从而产生大量剩余劳动产品，进而带来原始社会的分工。原始社会经历了六次大的分工，每一次分工都标志着生产力水平的进步和劳动教育的发展。

一、攫取劳动教育

原始社会的自然条件极端恶劣，原始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们只能结成原始群体，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获得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这是一种自然分工条件下的攫取经济，如成年男子从事捕猎等劳动，妇女从事采集和原始种植等劳动，老年人指导生产，小孩帮助妇女劳动。另外，自然分工还体现在生产方式单纯依赖生存环境和自然条件，如出现靠山者为猎人、近水者为渔夫、居草者为牧民、住沃野者为农夫的发展趋向。自然分工导致与之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得以积累。由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攫取劳动教育依托自然分工而出现。但是，那时的教育活动只能是单一地传授采集、狩猎、耕作等活动的基本技能和如何躲避危险、获得温饱的基本生活经验。这样的原始教育活动仅仅是广义上的教育现象，在人类原始生产生活中自然存在。

原始人群阶段先民以采集为主要生活来源。妇女是采集经济的主要承担者，并负有教育儿童的责任。据《尸子》记载：“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渔猎一般由男子担任。考古发现蓝田人以石球为狩猎武器，原始弓箭出现，狩猎技术需多人协作方能完成。《尸子》还记载：“燧人之

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渔”。山顶洞遗址曾出土一条青鱼上眶骨化石，是氏族社会捕鱼的重要证据。《世本》记载：“黄帝时，诸侯有夙沙氏，始以海水煮乳，煎成盐。其色有青、黄、白、黑、紫五样。”说明原始社会末期出现海水制盐技术。对火的利用之前，原始先民“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①；“民食果始，腥服恶臭，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会利用火之后才使“炮生为熟，令人无腹疾，有异于禽兽”（《韩非子》）。一般认为燧人氏为取火技术的发明者。《韩非子·五蠹》中记载：“上古之世……有圣人作，钻佐木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另据《太平御览》记载：“伏羲蟬于伯牛，错木取火”，人工取火技术扩大到燧人氏以外氏族。宓羲氏、燧人氏、夙沙氏等对渔猎、取火、制盐等技术技能的发明和传播成为原始社会的重要教育内容。

二、农业生产劳动教育

大约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人类社会历史上经历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生产经济与攫取经济的分离。具体来说，就是采集、渔猎与农业、畜牧业的分离。这是原始社会发生的一场社会经济革命，带来了人类最初的社会分工。

从江苏吴县和西安半坡等地的考古发掘证明，早在七八千年以前，我国就开始了农业生产。如黄河流域种植了粟，长江流域种植了稻。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便产生了教民农作的职业性教育。对此，古籍有如下记载：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②

“包羲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③

① 《礼记·礼运》。

② 《白虎通》卷一。

③ 《易经·系辞下》。

“尧聘弃……拜弃为农师，封之台，号为后稷”。^①

“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②

上述记载，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尽管宣扬了圣人造世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但也反映了原始农业的发明和农作技术传授的某些事实。客观上讲，农耕技术应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是原始人类在长期从事采集活动的基础上逐渐发明的。

考古发现，北方仰韶文化与南方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农业为典型代表。仰韶遗址，耕地分布在村落附近，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和华县泉护村等遗址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都发现了谷物的皮壳，经河北农学院鉴定为粟。另外，在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罐中，还发现有白菜或芥菜之类的种子，可能是人们当时有意储藏，以备种植用。可以证明，在我国农业生产上，不但种粟，而且种植蔬菜也有悠久的历史^③。再有，1972～1974年在浙江省余姚地区河姆渡发现一个新石器文化遗址，在遗址第四层400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堆积，最厚处达七八十厘米。根据对谷粒外形鉴定，其属于栽培稻的籼稻稻谷，距今约7000年。学者考证，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的农具是骨制耒耜，一般认为耒耜为两种农具，其区别在于刃部的不同，耒是双齿刃，而耜是有宽度而尖首形的耕具。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的骨制耒耜76件，骨制耒耜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此为原始农具重要的飞跃。这是比刀耕火种进步的农耕方法^④。

三、畜牧业生产劳动教育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几乎在发明农业的同一

① 《吴越春秋·吴太伯传第一》。

② 《孟子·滕文公上》。

③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④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页。

时期，由于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及狩猎技能的提高，剩余劳动产品中也包括狩猎所捕获的动物，圈养在定居地，为驯养动物创造了条件。于是，原始畜牧业产生了。《淮南子·本经训》中有“拘兽以为畜”的记载，标志着畜牧业起源。早期人类在长期狩猎的劳动实践中，为了补充食物，时常有意将一些幼小的野生动物带回家中饲养，逐渐发现有一些动物可以驯化成家畜，从而出现了原始畜牧业。狗、山羊最早被驯化，其次是猪、牛、驴、马，再后是火鸡、鸡。约在新石器时期晚期，一般家畜已先后形成。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中有多达一千余头牛和猪的遗骸堆积；浙江河姆渡、罗家角文化遗址中有猪骨和猪塑像，以及水牛和鹿的头骨堆积，均可证明至迟七千余年前不少重要的动物已分别在中国南方和北方驯化。传说伏羲氏“教民养六畜，以充牺牲”；还有伏羲氏“茹毛饮血，教民渔猎”之说，反映了人类在渔猎经济时代驯化家畜的努力；同时也表明最初饲养的家畜是供肉食和利用皮毛，也被用作祭品。到五千多年前从神农到黄帝的传说时代，家畜渐被用于驾车使役。以此看来，无论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或是河姆渡文化均有畜牧业的萌芽，农业与畜牧业生产技术传承越来越成为原始先民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依托，积淀了未来畜牧业饲养与防病的经验。此经验在生产与生活中逐步传承。^①

四、手工业生产劳动教育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指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及人类定居生活，促进了手工业领域的不断扩大和原始工艺技术的传授日趋专门化。这一时期，除石器、骨器、木器等工艺制作外，还出现了制陶、纺织、房屋建筑以及育蚕治丝等原始手工业。

根据对原始制陶工艺的考证，这种技能的传授不仅具有相当丰富的内容，

^①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而且需要相当高的技术水平。如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细泥彩陶、西安半坡出土的黑陶，都堪称精美的艺术品。在西安半坡、华县泉护村等遗址，都发现了一些专为制造陶器的土窑遗址。仰韶文化的制陶工艺以彩陶为主，成就最高、精品最多。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石、陶制的纺轮，当时人们必然已知利用纺轮的原理捻纱的技术。另外，因氧化作用而变成红色或红褐色，使彩绘纹饰附着在陶器上，由于这种精美花纹特点，故有人称之为“彩陶文化”。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器种类较多，如炊具有鼎、釜、陶灶等，饮食器有钵、碗、盆、盘、杯等，储藏器有瓮、罐等。原始制陶工艺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水平，洗陶、制坯、装饰、烧制四道工序都具有严格细致的工艺要求，另在制造陶轮、砌窑、烧窑过程中需要许多物理与化学知识。西安半坡出土的氏族社会晚期的黑陶器，器壁薄如蛋壳，质地坚硬，表面漆黑有光，工艺精美。这就要求对每个参加制作者进行严格的训练，培养职业性的知识与技能。

又如育蚕治丝、缝衣技术的传授，同样体现了教育的职业性。《史记》提到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嫫祖为妻，她发明了养蚕，为“嫫祖始蚕”。后有碑文记载：“嫫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谏诤黄帝，旨定农桑，法制衣裳，兴嫁娶，尚礼仪，架宫室，奠国基，统一中原，弼政之功，殁世不忘。是以尊为先蚕。”相传嫫祖是西皮氏之女，即黄帝元妃，最早教民育蚕治丝，后世称其为先蚕。这些记载都说明了黄帝时代已经发明和传承了饲养家蚕、缫丝织布做衣服的技术。

五、天文观测知识和技术的教育

第四次社会大分工是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之中分离出来。天文观测、制定和掌管历法、宗教和巫医等专门人员从体力劳动者中间分离出来，并专司其职。农业与畜牧业生产需要产生了最早的天文观测技术。当时的人们开始注意到太阳升落、月亮圆缺的变化，从而产生了时间和方向的概念。考古发

掘发现，半坡氏族的房屋都向南开门，一些氏族的墓穴也都向着同一个方向。人们还在陶器上绘制了太阳、月亮乃至星辰的纹样。《中国天文学史》记载，“大约在公元前 2400 年，我国已经利用观测大火昏见来确定春季之始”；五帝时，“观象授时”以定农时。《史记·卷二十六·历书第四》记载：“神农以前尚矣。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唐司马贞为《史记·历书》所作索引载：“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桡做甲子，隶首作算术”。天文、历法、祭祀、占卜等方面的知识技术得到萌芽和发展。

六、原始交换与商业萌芽

第五次社会大分工是商人阶层的萌芽。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出现必然带来交换的产生。《易经·帝系篇》中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这就是最早的商业活动。有人认为，舜是第一商贾。产品交换很早就发生了，至少不晚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出现。但是只有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交换才得到了长足的进展。交换与商品生产相互促进并发展。伴随交换规模扩大，品种增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的产品交换越来越不便利，于是专事交换的中间人——商人应运而生。考古发掘，在青海乐都柳湾的齐家文化马厂类型墓葬中，四十五号墓出土了三枚海贝，九十一号墓出土了仿贝制成的石贝，三、四、五号墓出土了骨贝，五零三号墓出土了蚌贝。这些物品虽然还有装饰品作用，还不能算作纯粹的货币，但从其普遍性和以石骨仿制贝的出现来看，贝可以被认为原始货币。海贝不是西北地区的产物，很可能是由交换得来的。^①

①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7 页。